

## 【述 评】

# 2010 年国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综述<sup>1</sup>

马戎, 马雪峰, 祖力亚提·司马义, 阳妙艳, 赵蕊

为了使国内读者能够概括了解 2010 年西方社会学界在种族-族群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在为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年度报告中选取了 4 本英文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Social Forces》在 2010 年发表的与种族-族群研究专题相关的论文, 介绍给大家。这 4 本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可以大致代表了国外社会学学科在相关年度的研究重点和具体专题领域中的最新成果。

为了展示不同年份论文领域重点的变化, 表 1 介绍了 2009 年和 2010 年这 4 种英文社会学期刊所发表论文的专题分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与 2009 年相比, 国外社会学家在 2010 年研究和出版重点的变化。在 2010 年这 4 种期刊总共发表论文 202 篇, 书评 246 篇。表 1 显示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专题在 2009 和 2010 这两年都集中在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 (36 篇、38 篇)、家庭婚姻与性别研究 (26 篇、24 篇) 这两大核心领域。

表 1、2009 年、2010 年 4 种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研究专题分布

研究主题	AJS		European SR		Social Forces		ASR		各主题篇数		各主题百分比%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2009	2010
移民/族群研究	7	9	4	9	13	12	12	8	36	38	18.2	18.8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	4	2	9	10	8	9	5	3	26	24	13.1	11.9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5	5	7	2	2	-	2	3	16	10	8.1	5.0
组织与制度研究	5	5	-	-	2	2	4	5	11	12	5.5	5.9
经济社会学	4	-	2	1	4	11	2	3	12	15	6.0	7.4
教育研究	1	-	1	9	9	10	2	1	13	20	6.5	9.9
政治社会学	4	4	-	3	6	5	2	3	12	15	6.0	7.4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	2	2	1	1	-	2	-	5	3	2.5	1.5
人口问题、青少年	-	1	-	-	5	2	2	-	7	3	3.5	1.5
文化、宗教	5	-	1	-	6	8	2	4	14	13	7.0	6.4
历史社会学	-	3	-	-	-	2	-	-	-	5	0.0	2.5
法律研究	-	-	-	-	6	4	2	1	8	5	4.0	2.5
社会政策	-	-	-	-	-	-	1	2	1	2	0.5	1.0
劳动问题	-	-	9	4	-	-	3	-	12	4	6.0	2.0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	-	4	1	-	3	-	1	4	5	2.0	2.5
研究方法	-	-	2	2	-	1	4	4	6	7	3.0	3.4
环境问题和灾难研究	1	-	-	1	1	2	-	2	2	5	1.0	2.5
社会心理学	-	-	-	1	-	4	-	1	0	6	0.0	3.0
医疗健康	-	2	-	1	3	3	-	-	3	6	1.5	3.0
其他专题	2	2	1	-	1	2	1	-	5	4	2.5	2.0
(专辑)全球化	-	-	6	-	-	-	-	-	6	-	3.0	0.0
论文总计	38	35	48	45	67	80	45	41	199	202	100.0	100.0
书评总计	205	173	7	7	58	66	0	0	270	246		

<sup>1</sup> 本报告是作者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0) 年度报告基础上, 选择了族群研究这一领域的专题内容补充修订而成。



下面把 2010 年这 4 个期刊在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这一主要研究领域所发表的 38 篇论文进行介绍。尽管这些介绍在本文中只能十分简略，但读者从中可以了解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思路、数据来源和主要观点。如果读者对相关论文有兴趣，可进一步查阅相关论文全文。所以，这里提供的信息可被看作是这 4 种杂志在这一领域发表各篇论文的索引。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希望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到 2010 年度国外社会学界在种族-族群研究领域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选题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在 21 世纪，无论是领先进行工业化的西欧，拥有古老文明历史的中国和印度，由欧洲白人殖民者建立的澳洲和北美洲国家，还是从百年殖民地苦难中得到独立的非洲国家，今天世界上如何一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多种族、多族群社会，各群体通常保持自己祖先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许多隔阂、矛盾与冲突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差异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隔阂与矛盾如果能被及时化解，就可以避免演变为街头骚乱和流血冲突，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化解种族和族群矛盾，从目前来看，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各族成员中逐步把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建立起来并使其成为核心认同身份，同时把各族的文化传统、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视做文化特征，在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和谐共处。这应当是各国解决种族、族群、宗教冲突的唯一出路。因此，把多族群国家的少数群体问题“政治化”即强调他们的独特政治地位和自治权利，还是把少数族群问题“文化化”即强调他们与主流群体成员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同时尊重和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也就成为各国政府族群政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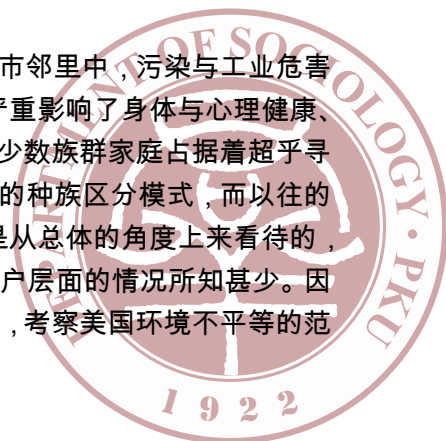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从这 4 种期刊在 2010 年发表的关于种族/族群研究的 38 篇论文分别进行介绍。

### **1.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 篇)**

(1) 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John R. Logan 与德克萨斯 A&M 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Charles Zhang 的文章《全球邻里：多样性与隔离研究的新路径》(Global Neighborhoods: New Pathways to Diversity and Separation) 讨论美国居住隔离状况变迁。以往，社会科学家大多接受邻里结构变化的典型分析路径，即通过实证数据来分析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状况。芝加哥学派用社会生态学的隐喻，即入侵 (invasion) 与演替 (succession) 来说明这一状况与趋势。作者试图用新的经验材料来重新审视支配了 20 世纪的种族变迁理论。作者指出，1980-2000 年间，学者们在分析邻里种族构成时发现，多族群的都市区域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相对稳定的族群居住整合。这些区域被称为“全球邻里”，它们曾经是纯粹白种人居住区。如今西班牙语裔与亚裔迁入，率先成为邻里中的整合者，接着又有黑人随之迁入。但在一定区域内，居住隔离依然存在。作者研究表明，邻里的全球化为族群多样性带来一个新的积极因素，这一积极因素虽未完全消解传统少数族群居住隔离的入侵与演替模式，但确实在改变这一模式。

(2)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Kyle Crowder 与科罗拉多大学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iam Downey 合撰的文章《邻里迁移，种族与环境危害：建构环境不平等的微观过程》(Interneighborhood Migration, Race,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s: Modeling Microlevel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关注美国都市地区环境不平等与种族差异间的关系。

以往研究表明在聚集大量非裔美国人与西班牙语裔居民的美国都市邻里中，污染与工业危害的浓度往往最高。而且证据显示，暴露于环境危害下的种族不平等还严重影响了身体与心理健康、教育、社会秩序观念等。也就是说，在有着高度环境危险的邻里中，少数族群家庭占据着超乎寻常的比例。作者认为，这种环境危害的种族不平等导致了邻里间迁移的种族区分模式，而以往的研究对这种潜在的微观迁移过程几无认识。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总体的角度上来看待的，而且多是涉及几个区域或个别族群，人们对这一问题在个人层面或家户层面的情况所知甚少。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结合个人层面的资料与邻里层面的工业危害数据，考察美国环境不平等的范



围与原因。他们具体分析了白人、亚裔、黑人等在微观方面的差异，及其在住宅迁移中的最终决定与实践。作者对迁移模式的考察表明，即使在个人教育、家庭收入、与其他微观方面没有什么差别，相比同等条件的白人住户，黑人与拉美裔住户所迁入的邻里往往有更高的环境威胁。

(3) 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Nancy Luke 所撰《移民的竞争义务：非洲城市中的性伴侣与寄回农村故乡的汇款额》(Migrants' Competing Commitments: Sexual Partners in Urban Africa and Remittances to the Rural Origin) 讨论移民 (本文为国内移民) 过程中的互惠、交换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作者指出，移民在都市目的地发展出来新的非家庭式性关系，这种新关系同移民的原有家庭关系形成竞争，特别是在汇款方面。以往也有不少研究谈到移民汇款回家乡的行为，但是，这类研究很少关注移民在目的地拓展出的非家庭式新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连的收益与支出。

作者指出，新建立的性伴侣为都市移民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甚至替代了他们原来的乡村关系网络。与此同时，新关系也要求互惠的义务，或是金钱，或是财物。对非洲移民来说，城市中的非家庭式新关系与农村故乡的家庭式关系均有提供资源的义务，他们必须对此加以平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在都市中的性伴侣以及他们给伴侣的金钱与礼物是否影响到他们给农村家庭的汇款？

作者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即竞争性的义务，来理解个人如何在相互冲突的资源要求之间做出协商。他试图分析，移民们在何种情况下，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在两种关系之间做出平衡。作者以“替代”的概念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商品、服务或亲密关系都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特别是当它们复制着同样的收益时。同时，个人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支持甚为重要，他们获益越多，他们就有义务回报更多。那么当新关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增强时，其所需贡献的资源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这也伴随着原有关系的减弱，及其相应的资源义务的减少。最极端的情况是，新关系完全取代原有的家庭关系，这导致原有关系及其相应资源义务的终结。在两种关系没有相互替代的情况下，我们便无法观察到资源平衡问题。因此，两种关系及其资源义务的平衡问题主要在于其相互的替代程度。

作者根据肯尼亚都市移民的定性与定量资料对此加以验证。结果发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sub-Saharan Africa)，移民目的地中有各种各样的新关系能够产生乡村关系所能提供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严肃认真的非婚性伴侣就是其中之一。研究发现，移民在都市目的地发展的各种性伙伴关系，部分地代替了其原有家庭式关系。特别是一些移民结交女友后发展出长期性伙伴关系，这些非婚性伴侣能够提供移民所需要的心理支持。这种互惠式关系也要求移民回报以金钱或礼物，这直接减少了移民对其乡村家庭的汇款额。而其他类型的性伙伴关系则与家庭汇款水平没有直接关联。作者指出，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竞争、交换的本质。

(4) 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Ann H. Kim 与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Michael J. White 合撰的文章《泛族群性，族群多样性与居住隔离》(Panethnicity, Ethnic Divers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主要讨论在不断增长的族群多样性背景下族群边界的建构，以及种族与族群居住格局问题。作者认为，不断增强的族群与种族多样性为族群边界的重塑带来了机会，同时，伴随着族群整合与东道社会 (host society) 接纳之间的动态互动，它也为新的族群分类带来机会。

在美国，泛族群性这一社会概念只是最近才建立起来的。这一概念主张承认拥有自身边界的族群与文化多样性。对泛族群性的群体而言，其边界超越了国家出身，泛族群性群体自认共享一些结构性的或文化特质，但其边界并未跨越族裔-民族之界 (ethnonational lines)。对共享泛族群标记的人群来说，族裔-民族边界依然具有意义。这种泛族群性与族群性的交迭在有关认同的研究中已有证明，但是，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研究上，导致这种交迭状况的结构情境本身尚未得到论证。



以往的研究认为,因职业或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共享结构位置是产生族群与泛族群认同与边界的情境,但是,很少有研究系统地说明,族群互动是否以这种假定的方式建立起来。因此,他们考察了泛族群群体(panethnic groupings)在决定都市族群居住格局中的作用。二人认为,现在的相关研究要么只采用广义的泛族群路径而拒绝采纳更精确的族群定义,要么排除泛族群的分类而仅考察几个特选族群的居住位置。作者试图结合更广义的泛族群性概念和狭义的族群性描述(即祖先起源)来考察居住格局问题。

作者认为有必要讨论泛族群假设,特别是泛族群分类中的同质程度,或说呈现族群之间社会距离的减弱程度。为达此目标,作者提出的研究问题即符合泛族群边界的族群-民族起源群体是否更可能共享居住空间。结论表明,居住格局中有明显的泛族群现象。但是也发现在都市地区共享空间位置并不是泛族群意识的必要条件。他们试图强调在不断增长的族群多样性背景下,如何研究族群边界的建构以及种族与族群居住格局。在黑人、白人与拉丁美洲裔中可以考察到,泛族群小群体之间拥有较低程度的社会距离,但是,在种族化的情境下,族裔民族群体依然有一定的独特性。

(5) 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 Aaron Gullickson 的文章《吉姆克劳法出现前种族边界的形成:1880年美国黑人/白黑混血人口职业差异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Racial Boundary Formation at the Dawn of Jim Crow: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Black/Mulatto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关注美国混种族人口社会地位的差异状况。随着种族通婚的不断增长,美国的多种族(multiracial)与混种族(mixed-race)人口现象也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新兴趣。作者认为,相关研究缺乏对历史的关注,忽视了黑人与白人多种族交往的复杂历史。

作者指出,尽管“黑白混血儿”一词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意义,但是在1850-1920年间,美国的人口普查承认这一范畴。20世纪早期这一范畴的消失,标示着美国种族边界的重要转变。本文采用1880年以来的普查资料探讨这一曾经存在过的多种族分类。作者认为,种族分类与等级从曾经的奴隶制转变为吉姆克劳(Jim Crow)种族隔离法,既不是瞬间出现的,也不是普遍的,19世纪末的状况恰恰能让我们窥见美国南部的种族边界形成过程。作者特别考察了1880年美国普查中黑人与白黑混血人口之间职业差异程度的变化。他发现,混种族范畴所扮演的角色,是缓冲阶级还是一种地位威胁,取决于当地的结构特征,特别是白人的阶级构成。在白人拥有高职业威望因而很少担心白黑混血群体威胁的地方,黑人与白黑混种族人口之间的职业差异是最大的。而且,在白人拥有相对低地位的地方,职业差异也导致种族暴力的增加,特别是白人对黑人施以私刑的可能性。相反,在白人拥有相对高社会地位的地方,白人对黑人处以私刑的风险降低。

(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reas Wimmer 与哈佛大学的 Kevin Lewis 合撰的文章《种族同类性:Facebook中友谊网络的ERG模型》(Beyond and Below Racial Homophily: ERG Models of a Friendship Network Documented on Facebook),讨论友谊网络的模式。

美国社会网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高度的种族同质性,这往往被归结于种族同类性(racial homophily),即个体往往优先选择与同种族背景的人交往。Wimmer 和 Lewis 试图揭开种族同质性的本质,他们区分出不同的社会联系的形成机制,并讨论这些机制对社会网络的种族构成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绘制了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ing),从经验上说明这些机制,并且以facebook中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交往资料为基础,建立丰富的新数据库。结果发现,种族同质性不仅源于一定的种族同类性,而且也可归因于同种族背景中的族群同类性,以及交往中的平衡机制,举例来说,即友谊呼唤的倾向,人们倾向于同朋友的朋友结成朋友。这些因素大大增强了同类性对同质性的影响。因此,作者进一步考察了种族同类性的重要性,将它的影响与构成社会联系的其他机制的影响相比较。结论指出,平衡机制,住所的接近,与非种族范畴的同

类性（譬如“精英”背景的学生，或来自同一个州）对社会联系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比种族同类性更甚。

(7)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ybelle Fox 的文章《救济的三种世界：种族，移民和美国城市中的公共与私人社会福利花销》(Three Worlds of Relief: Race, Immigration, and Public and Private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in American Cities, 1929) 关注美国社会福利中的种族与族群模式，分析了社会援助体系中黑人、墨西哥人和欧洲移民这三个群体（作者所称的三种世界）的地位与处境。

Fox 以 295 个城市中的公共与私人救济花销为数据库，考察 1929 年美国社会福利配置中的种族与族群模式。其研究发现，在大萧条前夕，有着较多黑人或墨西哥人的城市花了最少的钱在社会援助上，反而严重依赖私人捐款来资助其社会援助项目。而拥有较多欧洲移民的城市则花费最多的金钱在社会救济上，更多地主要依赖公共基金。不同的政治体制，劳动力市场关系与种族意识形态更好地解释了不同城市之间社会救济花费中的差异。

(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ianna S. Paschel 所撰文章《差异的权利：关于哥伦比亚从色盲到黑人社群法的转变之解释》(The Right to Difference: Explaining Colombia's Shift from Color Blindness to the Law of Black Communities) 讨论哥伦比亚（拉丁美洲西北部的一个国家）的黑人政策的转变。

在 1990 年代之前，如同其他的拉美地区一样，哥伦比亚法律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色盲”，非裔哥伦比亚人的社会运动在国家政治中并不突出。然而，1991 年，哥伦比亚政府首次采用一项新的法规，即官方地承认其为“多族群”与“多文化”的国家，并制定了保护本国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1991 年的宪法影响深远，从短暂使用的第 55 条章程，到后来采用的第 70 条法规，也就是黑人社群法 (Law of Black Communities)，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该宪法造成了拉美地区有关黑人群体的普通立法。

Paschel 的研究意在探讨，尽管长期处于法律“色盲”的状态下，哥伦比亚为何在 1990 年代采纳了族群-种族立法？为何这一立法以“黑人社群/共同体”的名义来编纂黑人法，以及为何它以某个特定的族群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以“种族平等”的方式来界定这一问题？Paschel 认为，详细解读这一法律转变和对非裔哥伦比亚人的宪法保护，能帮助我们理解族群-种族政治以及社会运动理论。

根据档案分析与深度访谈，Paschel 指出，非裔哥伦比亚政治活动家能够把握住全球政策标准的转变，既考虑多元文化主义，又不引起国家的不稳定。他们既采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策略，又以族群差异的名义建构其需求。Paschel 的研究试图说明，社会运动如何有策略地运用政治机会，并阐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并说明为何在这种背景下，要获得黑人权利，族群差异框架是比种族平等框架更为有效的政治策略。

(9) 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Thomas S. Moore 撰写的《种族劣势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轨迹》(The Locus of Racial Disadvantage in the Labor Market) 关注的是种族歧视与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问题。

Moore 指出，种族歧视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但是因为它与反歧视政策有关，而且也因为这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如何运转具有重要意义。Moore 采用从失业工人调查 (Displaced Workers Survey) 中得来的混合抽样样本，在控制住失业前的经验与个人收入变量的同时，考察再就业中的种族差距。作者指出，以往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经验研究相悖，不能呈现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他提出另一种研究路径，来分析劳动力调查中雇佣与收入的种族差异，也讨论了再就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Moore 的研究发现,在再就业的薪水方面不存在种族差异,但是具有相同条件和经验的工人,在面临再就业机会上却存在着很大的种族差别。黑人失业后较低的再就业率也许可以归因于求职中的个人差异,但是,它与当代的就业歧视确实有所关联。

## **2. Social Forces (12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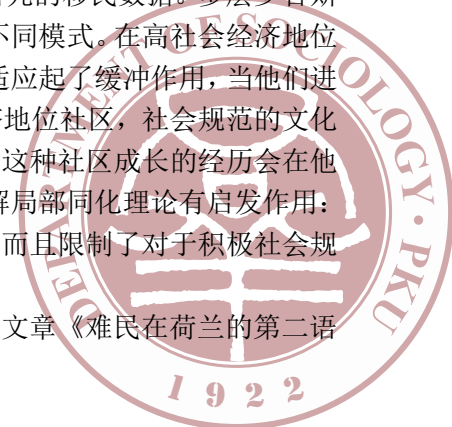
(1) 斯德哥尔摩大学 (Stockholm University) 的 Magnus Bygren 和 Ryszard Szulkin 合作的文章《瑞典移民子女孩童期的族群环境与教育获得》(Ethnic Environment During Childhood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Immigrant Children in Sweden) 主要探讨族群居住隔离是否影响瑞典移民孩子未来的教育生涯。作者使用的数据包括在 1995 年完成义务教育的同期群孩子。作者回顾了 1990 年他们处于孩童时期时的社区特征,然后追踪调查了 2003 年他们的教育获得年数。他们获得的教育水平不如在其他社区成长的孩子高:社区里面的同族群人口很多,而且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相对于那些成长在有同族群年轻成功人士的社区的移民,作者发现在族群飞地成长,对于个人发展有积极效应。在这项研究里,族群环境对于将来教育获得的影响,受到义务教育的学校成绩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

(2) 哈佛大学 Van C. Tran 的论文《英语的获利和西班牙语的失利? 第二代拉丁语裔青年成年期的语言同化》(English Gain vs. Spanish Loss? Language Assimilation among Second-Generation Latinos in Young Adulthood) 研究第二代拉丁语裔的语言同化过程。作者采用了移民儿童纵向调查的三代数据。在已有研究中,对第二代移民的时间推移中语言精通程度的变化,很少有人关注。作者主要有三点发现:首先,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熟练度都提高了;第二,拉丁语裔群体内部存在很大的族群差异,其中墨西哥移民子女的英语最不熟练,但西班牙语最为熟练;第三,在家和在校使用西班牙语对于英语的学习没有影响,但是极大地促进了西班牙语的使用。这些研究证实了双语社会情境的出现。

(3) 莱特州立大学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Chigon Kim 和纽约城市大学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yong Gap Min 合作的论文《本地出生亚裔美国人的婚姻模式和在家的母语使用情况》(Marital Pattern and Use of Mother Tongue at Home with Native-Born Asian Americans) 研究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的婚姻模式和在家时母语使用情况。作者采用从 2005 年到 2007 年美国社区调查 3 年的公众使用微观数据样本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3-Year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亚裔群体母语的使用具有内部差异,但是婚姻类型的内部差异则更显著。那些和本族群结婚者(族内婚)比与其他族群结婚者在家讲母语的可能性要大。在族内婚里,那些配偶是同族群 1.5 代或者第一代的人,比那些配偶是本土出生的人使用母语的可能性要大很多。Logist 回归模型分析法显示,婚姻模式是在家母语使用情况的最强预测因子,当把婚姻模式考虑进去的时候,母语使用的族群内部差异大大地减小了。

(4) 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uying Tong 的《移民青年的移民集中居住和自愿活动文化适应》(Foreign-born Concentration and Acculturation to Volunteering among Immigrant Youth) 研究移民青年对美国志愿服务社会规范的文化适应,以及文化适应是如何受到所居住移民社区环境的影响。作者采用的数据是国家青年健康纵向研究的移民数据。多层罗吉斯特回归发现居住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具有不同模式。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和不在本国出生的社区居民集中居住对于他们社会规范的文化适应起了缓冲作用,当他们进入成年早期的时候,这种作用开始持续的影响。相反,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社会规范的文化适应和他们所在社区的非本国出生社区成员的比例不相关。然而,在这种社区成长的经历会在他们进入成年早期的时候促进对于志愿活动的文化适应。研究对于理解局部同化理论有启发作用:和非本国出生的社区成员集中居住不仅能防止移民青年的向下同化,而且限制了对于积极社会规范的文化适应。

(5) 乌特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 Frank van Tubergen 的文章《难民在荷兰的第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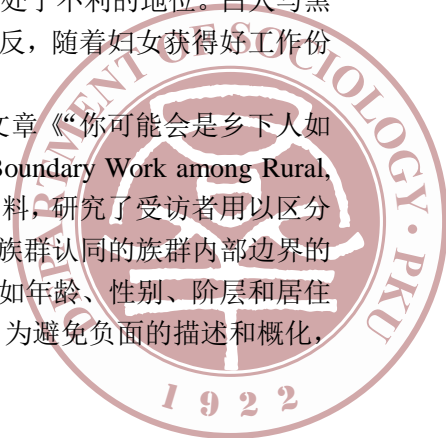
言熟练程度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mong Refugees in the Netherlands) 研究难民的语言学习。现有研究很少探讨难民在西方国家的语言学习问题。本文探讨了难民移民前后的特征和他们第二语言熟练度的关系。作者的数据来源于对荷兰 3500 名难民的调查,他们分别来自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研究发现,那些在移民前接受更多教育、来自大城市以及年轻时即移民到接收国的人,读和说的能力要好一些。移民之后的经历特征也很重要,那些在难民接收中心居住过一段时间、完成了接收国提供的相应语言课程、接受后移民教育、希望在接收国家定居以及自身较少健康问题的人,学习和掌握接收国语言的能力要更好一些。

(6)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的 Edward S. Shihadeh 和 Raymond E. Barranco 合作的论文《拉丁语裔雇佣和黑人暴力:美国移民政策的非预期后果》(Latino Employment and Black Violenc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US Immigration Policy) 主要研究美国移民政策影响下拉丁语裔雇员和黑人暴力之间的关系。美国 1965 年之后的移民政策导致了拉丁语裔人口的增加,同时,增加了低技能工作的竞争力水平。作者试图去检验,在拉丁语裔移民以及拉丁语裔人口在低技能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是否增加了城市地区黑人暴力的发生率。作者采用了 2000 年各城市调查的数据,主要得出了四条结论:(a) 拉丁裔移民和城市黑人暴力呈正相关关系;(b) 这种相关关系在拉丁裔在低技能就业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更为普遍;(c) 并不是所有的低技能部门都有同样的效应。黑人暴力只在农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作岗位缺乏的情况下增加;(d) 拉丁裔移民的就业导致黑人失业的增加,以此方式客观上增加黑人暴力活动。作者的研究对于了解美国黑人的社会状况以及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7) 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Matthew Hall 等人的文章《墨西哥移民的合法地位和工资差距》(Legal Status and Wage Disparities for Mexican Immigrants) 采用收入和项目参与调查(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的数据,对美国移民合法地位以及其工资情况进行了研究。作者估计了 4 种类型的工资情况:备案(合法)墨西哥移民、无备案(非法)墨西哥移民、美国出生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美国出生非拉丁裔白人。研究发现了备案和无备案墨西哥移民男性存在 17% 的工资差距,女性存在 9% 的工资差距。当控制劳工人力资本和具体职业的影响时,工资差距分别下降为 8% 和 4%。研究结果也发现了人力资本回报的明显差异。无备案墨西哥移民的人力资本回报最低,工资增长极为缓慢。

(8) 西华盛顿大学(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Raine Dozier 的文章《黑人女性从业者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1980-2002》(The Declining Relative Status of Black Women Workers, 1980-2002) 对黑人女性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比较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大大增加了工资间的不平等。女性并没有因为受到下降的制造业雇佣规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她们的收入已经相对较低,而且她们在服务业的较高雇佣规模中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然而,黑人和白人女性并没有得到平等待遇,黑人和白人妇女的工资差距增加了不止一倍。随着黑人和白人女性专业人才和经理等职业亮相的增加,黑人妇女更容易在这些职业里获得低工资。黑人证书持有者因为无法跟上白人证书持有者获得的可观收益而处于不利的地位。白人与黑人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并不是因为黑人妇女拿到了差的工作。相反,随着妇女获得好工作份额的增加,白人不成比例地从中获益。

(9) 孟菲斯市学校(Memphis City Schools) Carla D. Shirley 的文章《“你可能会是乡下人如果...”:南部农村白人的边界区分》(“You might be a redneck if ...” Boundary Work among Rural Southern Whites) 采用对密西西比州 42 个南部农村白人的深度访谈资料,研究了受访者用以区分其他社区的白人尤其是乡下人的方法,从而理解人们建构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族群内部边界的思路。作者发现,“乡下人”一词根据受访者对于南部人、社会地位(如年龄、性别、阶层和居住历史)和对这些社会特征的族群内部比较被以多种方式定义和归类。为避免负面的描述和概化,



他们对于族群内部关系进行了区分，并建立了成为农村、南部白人的正面联结。然而，围绕乡人所进行的多层面的族群内部区分工作，通过边缘化少部分白人的形式维持了白人霸权，并形塑了新的白人特质和理想的无污点的正常的优等白人的形象。

(10) 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Jesse Rude 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Daniel Herda 合作的论文《永远的好朋友？种族和青少年友谊的稳定性》(Best Friends Forever? Race and the Stability of Adolescent Friendships) 采用国家青少年健康跟踪调查的两波数据，研究同种族和跨种族友谊的稳定性。作者有如下发现。第一，跨种族友谊没有同种族友谊稳定，即便控制了一些结构的和二元的特征，如学校的种族构成、学生态度和行为的相似性等，也是如此。第二，二元相似（除了种族）变量是友谊稳定性的弱预测因子。第三，互惠和亲近变量是友谊稳定的强预测因子并且似乎弱化了种族差异的效应。这些研究结果说明，种族因素在美国青少年社会生活结构中起着持续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质疑了促使友谊形成的因素照样能促使友谊稳定这一假说，研究也暗示了要更多地关注跨种族友谊的质量。

(11) 西卡罗丽娜大学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的 Christopher A. Cooper 和 H. Gibbs Knotts 合作的文章《“迪克西”的褪去：现代美国南部的地域认同》(Declining Dixie: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Modern American South) 是一篇关于地域认同的创新性作品。作者通过研究近 50 年来“迪克西 (Dixie)”<sup>1</sup> 和“南部 (Southern)”在 100 个城市商业机构名字中的普及情况，从而探讨美国的南部地域认同。作者发现，采用“迪克西”的商业机构数目已经急剧下降，而“南部”则更为持续地被采用。作者以为，这提供了重新南部化的新证据。作者还发现，南部黑人数目的相对性为地域认同提供了最为一致性的解释。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内，人口密度也开始作为地域认同的一个显著预测因子。这些发现为地域认同、命名政治和南方社会学研究增加了弥足珍贵的文献。

(12)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Richard B. Felson 和西安大略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Paul-Philippe Pare 合作的文章《枪文化还是恐惧文化？武器持有的地域和种族差异》(Gun Cultures or Honor Cultures? Explaining Regional and Race Differences in Weapon Carrying) 研究持武器自卫的地域和种族差异。作者采用全国暴力普查数据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Men) Survey)，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受害风险之后，南部和西部的白人相对于北部白人更容易持有枪支以自卫。南北部白人的差异在女性之间尤其明显。在持刀或者杖方面，作者并未发现太多证据支持地域或种族差异。作者指出，这些发现支持了这么一个观点：持枪的地域差异反映了枪文化而不是恐惧文化。在黑人中间，作者发现了更多的证据支持恐惧文化：在控制了受害风险之后，他们比白人更倾向于持刀或者抢。

### **3.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 篇)**

(1) LaFree, Eric P. Baumer 和 Robert O'Brien 在《隔离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一个自 1960 年以来凶杀逮捕记录中黑人和白人差距的城市等级分析》(Still Separate and Unequal? A City-Level Analysis of the Black-White Gap in Homicide Arrests since 1960) 一文中强调了在家庭结构、经济以及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居住整合、药物滥用、人口结构方面的种族差异。40 多年前 Kerne Report 曾记录了 1960 年代激烈的种族骚乱，并预言美国会加速迈向种族隔离和社会不平等，然而几乎没有人研究以暴力率来探索种族不平等性的发展趋势。自 1960 年以来黑人和白人在暴力率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了吗？假若如此，又是什么原因？从最近有关同化和文学方面的种族不平等现象的研究中，作者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黑人和白人在暴力率方面的差异性以及过去四十年这些比率如何变化的假设。使用凶杀逮捕嫌疑人的种族身份记录和 1960-2000 年美国 80 多个大城市有关社会、经济、人口因素方面的调查数据，作者认为黑人和白人在凶杀逮捕率方面有大幅度的重合，尽管这种重合从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有所间断。这种结果符合理论期望，作者

<sup>1</sup> 迪克西是美国南部某地域的称呼。



发现从 60 年代起，城市中凶杀被捕率在种族上差距有更大幅度的下降，并且相对于白人单亲家庭，黑人单亲家庭在凶杀被捕方面的比率下降幅度更大。同样，在城市中，由于城市经历了更快的人口增长，黑人在人口比例方面也在增长。因此，城市中凶杀逮捕方面的种族差距加大了，并且相对白人而言，黑人在因毒品被捕方面的比率在上升。相对于白人而言，黑人在凶杀被捕方面的比率并没有受到种族融合措施的明显影响。

(2) Andreas Wimmer 和 Yuval Feinstein 在《1816年至2001年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地崛起》(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 一文中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过去一百多年民族-国家代替了帝国、王国和城邦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这一问题。作者使用了一个新数据库，它包括了当今145个国家从1816年到他们获得民族国家地位那年的相关资料。作者检测的主要范畴主要有现代化、世界政治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历史事件分析表明，当一种政权转型允许民族主义者推翻或吸收既定的行政整体时，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民族国家这种政权形式会在一个帝国内或邻国间进行扩散，因为这有利于民族主义者的权力平衡。作者发现工业化对此的影响并不显著，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的启动，直接统治日趋加剧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些因素都和 Gellner, Anderson, Tilly 和 Hechter 的现代化理论有关。正如 Meyer 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所指出的，日益增长的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霸权主义模式，也不是一个对各民族国家形成路径的很好的前景。文章的结论是：全球民族国家的兴起缘于当地及区域各级邻近的和背景性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国内或全球操纵的结构性力量，这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论点相一致。

(3) Reanne Frank, Ilana Redstone Akresh 和 Bo Lu 在《拉美裔移民与美国的种族秩序》(Latino Immigrants and the U.S. Racial Order: How and Where Do They Fit In?) 一文分析拉美裔移民是如何理解美国现行的种族分类的，以及美国现行的种族秩序如何影响这种理解。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新海外移民的调查，分析点在于未来美国的种族秩序将如何改变以及将会如何运行。作者发现当被问及自我认同时，大部分拉美裔移民承认白人身份的优势，但是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里，通常不会接受这种白色的特权。作者发现，拥有相对较深肤色的拉美裔移民在年收入这个领域中都经历过肤色上的歧视。而且那些被最大程度地整合进美国社会的拉美裔移民，也最有可能认识到美国现行种族分类格局。文章预测，一个种族边界正在拉美裔移民周围形成，即那些拥有较深肤色的拉美裔移民将会在美国种族分类体系中经历更多的歧视。

(4) Andr s Villarreal 在《当代墨西哥族裔中的肤色分层》(Stratification by Skin Color in Contemporary Mexico) 一文探讨肤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拉丁美洲族群关系经常在被当作美国种族关系研究的背景，关于拉丁美洲的种族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此专题。拉美各国(如巴西)广泛认可人口当中的非洲血统，这些国家的种族分类建立在肤色差异的基础上，并沿着一种黑色-白色的连续谱系来开展。相比之下，墨西哥主流社会在“土著”与“非土著”居民之间所认可的种族分类，主要不是建立于体质类型方面的差异，而是建立于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使用上。当今许多墨西哥人还是表现出对白皮肤和欧洲特征的偏好，即使墨西哥社会没有明确的肤色分类制度存在。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一项以国家为代表的墨西哥成年人的专项小组调查，以用来研究当今墨西哥以肤色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程度。尽管在肤色分类方面存在极端性的歧义，但是在访谈调查员之间对属于这三种肤色分类的人各自具有相当强的认同感。同时，研究结果还提供了将肤色作为社会分层标准的深刻依据。肤色较深的个体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方面明显处于较低水平，他们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中而不太可能变得富有，即使控制了其他个人特征后也是如此。

(5) Chang Hwan Kim 和 Arthur Sakamoto 在《亚裔美国男性与美国白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实现平等了吗?》(Have Asian American Men Achieved Labor Market Parity with White Men?) 一文使用了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以研究美国亚裔男性与美国白人男性在收入方面的差异性，该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了扩展，并通过分析亚裔男性的移民身份与美国教育体制的关系来讨论大学类型及研究领域的影响。在控制了后者净变量以及其它人口统计因素，关于收入方面，本土出



生的美国亚裔男性比白人男性低了38%。作者发现完全受过海外（母国）教育的亚裔美国男性在收入方面存在很大劣势，在美国获取最高学位但高中完成于海外的美国亚裔男性，在收入方面处于中等劣势地位。网络控制的各项变量中包括居住区在内，仅仅只有1.5代亚裔美国男性似乎与白人达到完全平等。在作者的统计模型中，有关完全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共变测量显示，大多数美国亚裔男性至少稍有落后。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方法论似乎能够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是作者建议进行多个视角的相关性研究包括种族化层级观点，人口结构异质性方法以及同化理论。

(6) Michaela DeSoucey 在《Gastronationalism: Food Traditions and Authenticit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烹调民族主义：欧盟的传统食物与权威政治）通过建立“烹调民族主义”的概念，挑战了全球主义同质化力量的理念。分析了：(a) 食品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的方式可以界定和维持依附于国家的情感力量，(b) 反之，民族主义情感如何影响食品的生产与销售。多方法论的分析揭示了如何建构“烹调民族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象征性边界政治政策中的反民族关系紧张问题，并且作为国家传统文化的代表，“烹调民族主义”保护了某些食品行业。作者首先通过研究欧盟关于原产地命名标签的项目分析了宏观层面上的市场保护，因为标签界定了某些食物是为特定国家所有的。在微观层面，作者分析了关于法国鹅肝酱政治环境的实证性案例，并演示了生活经验中的肠胃民族主义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中发挥功能。鹅肝酱是一个特别的相关案例，因为泛民族主义系统中的其他党派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当说到几个社会学感兴趣的领域，包括市场，政治认同，文化的真实性以及全球化的复杂性等方面，当代的食品政治已经超越了象征性边界政治可以理解的范围。

(7) Suzanne C. Eichenlaub, Stewart E. Tolnay 和 J. Trent 在《Moving Out but Not Up: Economic Outcomes in the Great Migration》（在大迁移中迁出却没有得到经济提升的移民）一文试图分析1910-1970年间数百万南方人从南部迁出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一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南部经济社会的推力因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拉力因素。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此次迁移的参与者都积极地从教育程度，城市地位等方面来挑选他们将要迁入的地区，并且后来他们在目的地生活得很好。但是，为了充分测量此次迁移的成功，与那些留在南部的居民做一个比较是必要的。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调查报告，目的是为了将那些离开南部的移民与他们同时代的却留守在南部的居民进行比较，那些留守在南部的居民或者在南部内移动或者是固定在南部某一个地方的久居居民。研究结果显示那些离开南部的移民在雇佣地位，收入，以及职业声望等方面并没有明显受益。事实上，和区域内部移民相比，区域间移民通常在生活上要更糟糕。这些研究结果与认为移出南部将会受益的传统观点相矛盾，并且认为需要一个有关对离开南部的那些人经历的修正主义的解释。

(8) Jacob S. Rugh 和 Douglas S. Massey 在《Racial Segregation and the American Foreclosure Crisis》（种族隔离和美国的止赎危机）一文中认为住宅区隔离为少数民族客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小生境，这与次贷市场的风险有很大不同，次贷市场在抵押证券方面的需求很大，它或许可能成为二级市场。文章认为次级贷款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止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浪潮，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在抵押过程中已精心确定的市场机制，但这一浪潮也是一个高度种族化的进程。作者通过测量在美国排名前一百位的大都会区中的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的回归止赎行为来检测这一论点。同时作者还控制了多种情况下的住房市场（包括均值信誉）和环境再投资法案的覆盖范围、区划监管的程度以及总体次贷的增长速度。文章发现，黑人居民的相异性空间隔离是全美国大都会区指数行为的权威预测。为了分析通过空间隔离来影响止赎行为的因果机制，作者对二阶最小二乘模型进行估算并证实了关于全美大都会区止赎行为的数量和比率方面，空间隔离对黑人影响的因果效应。因此文章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种族居住隔离是导致止赎危机、过度建设、风险借贷行为、监管缺失以及房价泡沫破裂的重要因素。

#### **4.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篇)**



(1) Birgit Becker 的《童年早期文化知识的转化：社会、种族差异与家庭活动的中介作用》(The Transfer of Cultural Knowledge in the Early Childhood: So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ial Activities)指出，很多研究都揭示了文化资本对于儿童教育成就的重要性，但是几乎很少有人解释文化知识的代际传承机制。文章通过关注家庭活动的中介作用，分析了传递过程中的社会和种族差异。通过德国的“移民儿童的学前教育与教育生涯”项目的数据分析显示，在3-4岁的儿童中，那些拥有上流社会背景、接受良好教育的德国本地父母的孩子，在文化知识标准测试中的分数都明显高于那些未受到良好教育、处于下层社会的土耳其移民父母的孩子。在控制了家庭内部活动（如讲故事）和家庭外部活动（如上幼儿园）等变量后，家庭背景的影响明显减小了，只有种族出身的影响仍然显著。对土耳其移民样本的进一步分析揭示出，只有在父母大多用德文作为与孩子的交流语言时，频繁的家庭活动才会对孩子接受所在国文化知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互动影响表明，在移民家庭中，不仅家庭活动的频率很重要，家庭活动的文化内涵同样重要。

(2) Mirna Safi 的《欧洲移民的生活满意度：同化与歧视》(Immigrants' Life Satisfaction in Europe: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Discrimination)利用欧洲社会调查的第三轮数据，研究了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研究对象包括英国与其他13个欧洲国家。研究检验了用来解释移民个人幸福感下降的两个主要的理论假设：直线同化、歧视的影响。主要结论是：移民的相对不满并没有随时间和代际演变而减少，这反驳了传统的“同化”范式。但是，当在少数族群之间进行对比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主流社会中所感受到的歧视，应该是解释其低生活满意度的持续因素。这一研究还利用了工具性变量的联合回归分析来预测内生偏差，并对歧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测量。

(3) Liv Anne Støren 和 Håvard Helland 的《高中教育实现率的种族差异：性别与社会背景变量如何相互影响？》(Ethnicity Differences in the Completion Rates of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How Do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Social Background Variables Interplay?)比较了挪威高中教育在少数族群与主要族群中的实现率。作者检验了(a)移民群体的国籍背景差异，(b)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间的差异，(c)社会出身如何差别影响少数族群与主要族群，以及(d)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与父母的教育水平对主要族群学生的影响相比，父母的教育水平对非西方国家背景的学生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主流族群学生在高教育水平的父母那里获利更多，但是移民学生似乎从低教育水平父母那里失去的更少。在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支持方面，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在非西方背景的学生中，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女孩的影响显著，与父母有工作的影响相当。在各少数族群中，具有波斯尼亚、越南和斯里兰卡背景的学生表现特别出色。

(4) Michael Braun 的《欧洲内部移民的外语熟练程度：一项多层分析》(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Intra-European Migrants: A Multilevel Analysis)，以往对移民外语熟练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同一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变量可被整合到一个理性选择框架中，并且似乎这一作用过程可适用于不同环境。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已有文献做出三项贡献。首先，它将欧洲内部成年人移民数据作为一个特殊语境，对传统的一般性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欧洲内部的移民在迄今为止的各移民群体内部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第二，很多在官方数据中无法使用的变量被添加进去，研究的变量包括：移民的以往在外留居、移民动机、移民期间语言熟练程度、他的本族和外族朋友的数量等等回顾信息；第三，这一研究集中分析了母语熟练程度与族群的结构社会整合的不同影响。

(5) Maureen A. Eger 的《Even in Sweden: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Support for Welfare State Spending》(在瑞典：移民对福利国家开销的影响)指出，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欧洲福利国家的精简开支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关于福利国家消费的公众支持情况，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仍然很少。并且，新的压力，尤其是国际移民和随之而来的族群异质化，为福利国家带来了新的



挑战。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分析了瑞典社会福利花销的公众支持。瑞典是将 GDP 花在社会开销上比重最大的国家，而且直至现在仍保持着族群的异质性。根据多层模型分析结果，在国家层面上对移民问题采用的多重测量显示民众对福利国家花销的支持有显著的反作用，民众认为政府把过多的经费花费在移民的福利上。而且，近期大量迁入的移民使瑞典民众对政府在福利花费的态度上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分析明确证明，族群的异质性对社会福利开销的支持有着负面的影响，即使是在瑞典。

(6) Robert Erikson and Frida Rudolphi 的《Change in Social Selection to Upper Secondary School—Primary and Secondary Effects in Sweden》（重点中学的社会选择的变化——瑞典主要和次要影响）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IEO）是由两个独立的机制决定的：主要影响——从较高级的社会背景中出身的孩子在学校中表现更好；以及次要影响——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继续教育。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过渡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早先表现为下降的趋势。作者研究了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分析是基于1948到1982年间六个儿童同期群的纵向数据。首要影响和次要影响由平均绩点和认知测试成绩两者共同区分开来。对影响的评估基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中真实的和反事实的转变的比较。结果显示，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降总的说来似乎与首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一致变化相关。与基于年级的分类相比，以认知能力测试分类时，次要因素更强大。文章最后讨论了观察首要因素与次要因素区别所带来的结果。

(7) Ellu Saar 的《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Eston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horts Born between 1930 and 1974》（在爱沙尼亚的代际流动变化与教育不平等：1930年到1974年出生同期群的比较分析）中，作者比较了在1930年至1974年出生的四个同期群（cohort），以此来分析爱沙尼亚的代际社会流动。文章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研究问题。首先，爱沙尼亚的绝对流动率是如何变化的？第二，跨越同期群的社会流动趋势是什么？第三，在解释跨同期群的变化时，教育的作用是什么？作者对男性和女性分别进行了分析。分析基于2004-2005年爱沙尼亚社会调查的数据，收集了关于被试的工作经历和社会出身的回溯信息。作者发现，社会流动性确实跨同期群而改变，但不以不平等的增加或减少为特点。30年代同期群与40年代同期群的比较显示，两性的社会流动性都增加了。50年代同期群也增加了，但只表现于该同期群的女性。对于男性来说，在50年代同期群中，出身与成就的关系开始减弱。对于女性来说，这种趋势在最年轻的一代人（1974年）中很显著。研究的结论是，在爱沙尼亚跨同期群的社会流动变化，是由教育不平等来驱动的。

(8) Liza Reisel 和 Idunn Brekke 的《Minority Dropout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Using Competing Risk Event History Analysis》（高等教育中的少数族裔辍学生：利用竞争风险事件史的美国与挪威的比较分析）的研究目的是对挪威与美国的大学、学院中，主要族群与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持续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虽然教育制度和经济体质不同，但两个国家都面临着保证教育平等性的普遍挑战，尤其是对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利用竞争风险事件史分析，这篇文章检验了全国学生代表性样本，来评价主要族群和少数族裔学生从高等教育中退学的相对同比风险。研究发现，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倾向于加剧两类学生最初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而在挪威，两类学生的辍学风险没有什么不同。此外，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学生毕业率明显低于主要族群的学生，甚至在控制了中途辍学这一变量后也是如此。但是，在挪威则没有这样的差别。这表明，即使挪威的少数族裔学生也在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处于明显不利的状况，但他们在高等教育中仍然比美国的少数族裔学生遭遇更少的障碍。

(9) Robert Braun and Ruud Koopmans 的《The Diffusion of Ethnic Violence in Germany: The Role of Social Similarity》（种族暴力在德国的传播：社会相似性的作用）提出并检验了一个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极端暴力的时空传播。这个理论框架结合了与种族竞争有关的结构因素、社会分化、以及政治机会结构（它包含了决定种族暴力扩散程度的因素，这种因素有跨时空与跨

地域的作用，使确定的聚居地倾向于表现出种族暴力)等因素。研究者采用了 1990-1995 年间 444 个德国郡县的种族暴力事件史分析。与以往研究一致，研究者验证了政治机会、种族竞争和社会分化、媒体报道、早先种族暴力的严重性等等，是种族暴力演变的显著解释因素。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当社会相似性因素（它大大提高了跨地域蔓延的可能性）被控制之后，地理距离对种族暴力的蔓延并没有产生影响。这表明，在很多传播研究中发现的地理距离因素或许实际上不是由地理临近引起的，而是因为邻近的地域导致了社会相似性。

## 结束语

从以上 4 种杂志在 2010 年发表的 38 篇论文来看，社会学在族群/种族研究领域的主题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和跨国迁移、国内迁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论文当中，涉及的最集中的主题是三个，一个是居住隔离，第二个是移民的语言学习问题，第一个是就业中的不平等问题。这三个领域可以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传统核心专题，而且三者间存在密切关联。正是由于在不同种族中出现贫富差距或族群分层，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差距使他们分别居住在不同的社区，而低收入社区的学校通常教学质量较低，这样居住格局对各族群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机会造成显著影响，并体现在他们毕业后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而从发展中国家来到西方国家的新移民大多是出于生计考虑的贫民，他们来到接收国以后，通常居住在本族相对聚居的社区，这使他们的语言学习和教育资源处在不利的环境中。

除此之外，关于“民族”概念和族群记忆的讨论、族群心理、族群生育行为差异、移民社区与族群关系等专题，也都在 2010 年这 4 种杂志发表论文的涵盖范围中。在全球化和劳动力跨国迁移的社会发展态势下，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的族际矛盾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美国拉丁语裔在低技能产业的就业可能导致黑人就业状况的恶化，并进一步导致黑人暴力犯罪率的上升，因此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化解需要社会学家的特殊关注。在统一的国家公民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各族群的群体意识很强的情况下，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分配矛盾很容易导致以族群为单元的群体冲突，欧洲国家和美国处理这些矛盾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这 4 种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作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西方社会，而中国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时肯定存在明显的国情差距。但是这一点并不应当妨碍我们从阅读这些论文中吸取经验、知识和智慧。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既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上的“异”，同时也存在科技发展规律、市场运行机制上的“同”。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在与历史的纵向比较和其他国家经验的横向比较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而得以前进的。中国当前在许多领域面临重大危机，自然资源的竞争使中国南海和东海的主权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在非洲的投资和市场开拓也遇到国际势力的围堵和诬蔑，南亚形势的紧张也使中国西部边境安全出现隐患。同时国内许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人员素质低下使许多地区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效能，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社会矛盾、认同冲突也在各地逐步显现，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前景具有必要的风险意识。了解西方各国处理社会矛盾和策略与效果，注意吸收西方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结构变迁、分析社会运行机制演变、分析如何处理种族-族群矛盾的具体思路和措施，探讨各种应对政策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这些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在今后加强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肯定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